

從《幽明錄·楊林》到〈枕中記〉 ——六朝志怪與唐傳奇的承繼及其社會意涵

陳晉*

摘要

文學體裁流變的過程中，往往和社會情境交互作用，亦受到社會風氣、思想價值乃至宗教信仰等因素影響。從中國小說發展史的角度觀看，魏晉南北朝至隋末的志怪小說，與唐人所作的傳奇小說，兩者之間具有承先啟後的關係。六朝志怪以「實錄異聞」為主要特徵，重在保存神異奇事；唐代傳奇則逐漸轉向文人有意識的創作，藉由虛構情節寄寓思想，反映社會現實與文人心態。過去研究部分著重於唐傳奇文體特色，亦有從六朝志怪與唐傳奇的互文承繼關係出發的研究，然本文希望立基於過往的研究基礎上，近一步探討文本改寫背後所映照的時代意義。並以沈既濟之〈枕中記〉與其故事原型《幽明錄·楊林》為研究對象，探討兩者的情節承繼及其所反映的唐代社會文化內涵。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文本細讀與比較研究法，首先以「核心文本要素」為分類標準，梳理魏晉志怪至唐代傳奇的發展脈絡，考察《幽明錄·楊林》與〈枕中記〉之間的故事核心主題、情節結構、角色塑造、敘事視角及背景與世界觀的差異，進一步結合唐代政治制度、科舉文化、門第觀念、藩鎮局勢，以及佛、道思想等歷史背景，論述文本改寫的創作動機與思想意涵，並以「小說證史」的研究視角，探究文學作品與時代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

研究結果說明〈枕中記〉並非單純承襲《幽明錄·楊林》的故事框架，而是透過情節增補、人物深化及敘事技巧提升，使作品由記錄神異轉化為寄寓人生哲理與諷刺現實的傳奇小說。反映中唐士人在科舉競逐、政治動盪及仕途失意下的精神焦慮與生命姿態。從《幽明錄·楊林》至〈枕中記〉的改寫歷程，不僅呈現六朝志怪走向唐傳奇的文學流變，也彰顯唐代文人藉小說寄託現實關懷之創作特色。

關鍵字：〈枕中記〉、《幽明錄》、唐傳奇、志怪小說、小說證史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E-mail：pankutze@gmail.com
本論文經兩位雙向匿名審查通過。收件：2026/7/1。同意刊登：2026/8/20。

壹、前言

文學體裁之流變，常與時代政治變遷、文類意識及士人心態緊密交織。唐代傳奇小說上承六朝志怪傳統，下啟文言小說，亦是學術研究的核心場域。回顧近十餘年的前人研究，已有辨析唐傳奇自六朝志怪「粗陳梗概」跨入「作意好奇」的論著，且剖析傳奇承襲史傳筆法，形成融合史才、詩筆、議論，文備眾體的結構。學者亦藉由「同題敘事」的微觀辨析，揭示唐人重寫同一題材時，敘事視角與話語架構上的異同（陳昶融，2016，頁 11-14）。

關於《枕中記》之專論考辨，已有考證其作者沈既濟生平與政治遭際之論述，其中指出盧生夢中拜相與兩度遭誣貶謫的宦海浮沉，實為中唐險惡的政治實錄，亦是作者親歷楊炎之案，慘遭株連之禍的生命寫照（林彥杏，2012，頁 73-77）。在敘事上《枕中記》開創「以實筆敘官位，以虛筆營夢境」的三段式虛實對比（廖珮芸，2014，頁 93-96）。再者是中唐人士心態演變之論，安史之亂之後，盛唐國勢逐漸衰微，士人面臨社會及自我的疏離分裂，促使文學轉向私我書寫與避禍中隱的趨勢（廖珮芸，2014，頁 43-46）。

既有研究已奠定豐碩的研究基礎，然多偏向巨觀文體辨析或單一視角考察。本文以前人之成果為基石，以《幽明錄·楊林》至《枕中記》為研究核心，透過「核心文本要素」的分析方式對照情節增補，展開六朝至唐代小說文本的演進與其背後映射之社會文化變遷的探析。

貳、魏晉志怪與唐傳奇之發展脈絡

一、六朝志怪之創作動機

魏晉南北朝社會長期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態，面對現實世界的失序，人們對於命運、生死、鬼神與超自然力量產生高度關注，相關傳聞與神異故事也廣泛流傳於民間。起初受黃巾之亂餘波影響，造成三國分立之局面，八王之亂又引發五胡亂華形成慘烈的局勢，導致百姓流離失所不得安寧，玄學厭世之思想因此風靡一時（王國良，1988，頁 2）。宗教對志怪發展影響深遠，尤其東晉以降，許多高僧來華傳教，佛理逐步玄學化，同時受到士大夫階層的推崇，佛道思想甚至險些超越了儒家之聲勢（王國良，1988，頁 3）。魯迅則指出佛教傳入中原構成志怪小說醞釀的溫床：

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惶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訖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魯迅，2011，頁 46）

於是魏晉以來到隋朝末年，文化氛圍促使大量記錄鬼神靈怪、夢兆感應與異聞傳說的作品出現，形成後世所稱的志怪小說。從中國小說發展史的角度觀察，六朝志怪承接先秦以來神話、寓言與史傳中的神異書寫傳統，同時又為唐代傳奇提供了豐富的故事素材與敘事模式，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

以南朝宋劉義慶及其門人共作的《幽明錄》為例，此書為六朝志怪的重要代表之一，書中內容涵蓋鬼神靈異、民間傳說、夢兆感應與冥界故事，同時也可見大量與佛教相關的敘事。例如奉佛得福、輪迴轉生、地獄懲戒等題材，皆反映出佛教思想逐漸深入社會生活的現象。透過這些故事，不僅能觀察南朝時期民眾的宗教信仰，也能看出佛、道兩教互相影響與競爭的文化情況。於是宗教之發展與交融的過程、民間信仰勢力的趨向，都能從故事敘事中瞭然於胸。

六朝志怪小說雖以記錄神異事件為主要特色，但背後實際反映的是當時社會的思想風氣與信仰需求。無論是對鬼神世界的想像，或是對因果報應的迷信，都是深受時代環境影響所造成的結果。因此這些作品在保存民間傳說與宗教觀念的同時，也累積了夢境、異界、神仙相關的敘事主題，成為唐代傳奇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基礎。甚至是創作手法和技巧之上都有明顯的特性：

「在技巧上，大都以直接的方式，敘述人物、事跡……至於小部分作品，由於作者苦心經營，在人物的描寫、情節的安排等方面，有精彩突出的表現，則已蘊含了發展為唐代傳奇的可能性，意義尤其重大。」（王國良，1988，頁 35）

因此六朝志怪不僅是唐人傳奇具有開創性的源頭，更為其奠定基石，並在創作手法上有文學精緻度的提升。

二、唐人傳奇與史傳互文

魯迅曾道：「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然施之藻繪，擴其波瀾，故所成就乃特異。」（魯迅，2011，頁 46）可見唐傳奇源自於六朝志怪，唐人繼承志怪題材，為其披上華麗的辭藻，並將情節大幅擴展，使志怪小說轉而成為講求文學藝術與美感的文體。唐傳奇的「傳奇」一詞，實是源自於裴鉞《傳奇》之書名而來，而所涵蓋的範圍包括唐人所寫的故事和單篇小說。然而和六朝志怪不同的地方在於：志怪多是為了記錄奇異之事所寫，傳奇卻多是唐人有意而為之。胡應麟曾道：「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胡應麟，1963，卷 36，頁 486）因此有意識的創作是唐傳奇有別於先前六朝志怪的一大進程，也因如此而能從文學作品當中探析唐代社會風氣，從中窺見世人心態的樣貌。

六朝志怪以及唐傳奇皆與歷史發展有緊密的連結，如王國良《六朝志怪小說論》中所言，唐代修正史時，亦將志怪作品內容視作參考資料，甚至直接引用內文（王國良，1988，頁 35）。唐人將修國史、科舉進士、娶五姓女視為生命中重要的大事。然而修國史並不是人人都有能力做到，於是自作史便可以過癮達到替代效果。唐代士人這種撰史而能留名青史的使命感根植於心，儘管是進行小說創作，亦將作史之筆法融入其中。《枕中記》作者沈既濟即是一則案例，沈既濟撰有史書《建中實錄》（王夢鷗，1972，頁 2）。他如同唐代眾多傳奇作家，同時具有史學家身份，或將史家風範融入傳奇創作，藉由書寫文章故事，直抒己見傳達內心的想法，這也延續了抒情言志的傳統，寄寓言情。形成中國文學上一脈相承的道統，不論使用何種文體書寫，都能通過外顯的描繪而窺見內在的真情。

出現在中唐時期的唐傳奇結合特殊的時代風貌，由最初的通俗文學，逐漸有人文化的傾向。唐代受胡人文化影響，統一中原地區以後，開始大量提拔人才，尋找可為皇室所用的讀書人，因此原由貴族門閥一手遮天的政治局勢開始動搖，寒門子弟有了翻身的機會。直到晚唐藩鎮割據，士人理想甚至由入朝拜相封侯，轉而開始追求立軍功以報效國家。小說證史的方式可見唐代科舉制度、門第觀念乃至宗教信仰都是影響傳奇文類中心思想的因素，反而言之，從傳奇之中，亦可看見時代遺留的價值洞見。

唐傳奇的取材便也容納了唐代進士與娼妓戀愛風氣、藩鎮跋扈，弱肉強食和佛道盛行等題材。在宗教層面上，唐傳奇深受佛教影響，且多使用佛教詞彙用語於書寫當中（龔鵬程，2009，頁 500）。因唐高宗尊老子為太上玄皇帝，極力推崇道教，道士轉而在社會被賦予特殊地位，《枕中記》、《南柯太守傳》皆是佛道思想為題材之小說。

參、《幽明錄·楊林》之於《枕中記》文本演進

一、《枕中記》故事原型考證

《枕中記》是中唐時期具有代表性及諷刺意味的傳奇作品，作者沈既濟以盧生入夢體驗榮華富貴、出將入相的人生故事，闡明人生如夢之思想價值，同時也有諷刺、反映社會現狀的端倪。

六朝志怪小說之於唐傳奇，擁有繼承相連的血脈，眾多學者皆認為六朝志怪奠定唐傳奇的創作基礎，其中不少作品延續六朝故事底本，擴充續寫而成新版唐人傳奇之案例。學者考據的過程中，多將《枕中記》的源頭指向六朝志怪小說《幽明錄·楊林》。如蕭鳳嫻：「張漢良先生從主題學的角度詮釋，認為《枕中記》、《南柯太守傳》、《櫻桃青衣》，都是從南朝宋劉義慶編《幽明錄》中《楊林》故事而來。」（蕭鳳嫻，2000，頁 37）魯迅曾道：「干寶《搜神記》有焦湖廟祝以玉枕使楊林入夢事，大旨悉

同，當即此篇所本」（魯迅，2011，頁 76）。龔鵬程：「有不少名篇確實篇幅曼長、記敘委曲，然卻是六朝小說的改寫。如沈既濟〈枕中記〉，取材於《搜神記》之〈楊林柏枕〉。」（龔鵬程，2009，頁 497）由上述可見先前學者研究對於〈枕中記〉故事，皆肯定其有可上溯之源流。

雖然學者分別指明〈枕中記〉源於〈楊林柏枕〉、〈焦湖廟祝〉或《幽明錄·楊林》等六朝志怪作品，然而這些作品篇名貌似不同，實則內容相差無幾，僅只是小說收錄、散佚或經歷重新修編，所造成的名稱差異。因此我們確認〈枕中記〉故事原型源自於《幽明錄》當中〈楊林〉這一篇故事後（以下統一稱為〈楊林〉），便能進一步探究經歷朝代更迭及文學發展的進程。

二、從六朝志怪至唐傳奇情節內容之情節曲折比較

若以「核心文本要素」（Narrative Elements）為切入視角，系統性分析〈楊林〉與〈枕中記〉兩篇故事，主要從「核心主題」（Theme）、「情節結構」（Plot / Structure）、「角色塑造」（Characterization）、「敘事視角」（Point of View）和「背景與世界觀」（Setting / World-building）五個要素為準則。可以發現〈楊林〉到〈枕中記〉從篇幅長短、字數上即有很大的差距，〈楊林〉是僅有一百多字的短篇故事，而〈枕中記〉卻長達千餘字。志怪到傳奇除了篇幅的差異，在敘述邏輯和故事時間性的側重有所不同、事件結合方式亦不同，且在故事內設計的二元對立的理路、故事中的主體與客體乃至人物描繪上都不盡相同。

〈楊林〉中，主角楊林只是單父縣一名賈客，而故事的「核心主題」與主角的欲望皆由廟巫一句「君欲好婚否」（李昉，2005，卷 283，頁 349）被動引出，所求也僅止於好婚，進入柏枕裂縫後，看見朱樓瓊室，娶趙太尉之女，生六子，夢中歷數十年，醒後愴然。整體敘事相當簡略，重點在於柏枕本身的神異性，以及人可經由枕中裂縫進入異境的奇幻經驗。也就是說，六朝志怪此處所關注的主要仍是異事是否可記，而非人物內在欲望如何發展。

相較之下〈枕中記〉將原本簡短的神異婚姻故事，改寫為唐代士人追求功名富貴的完整人生寓言。盧生在故事中的形象是衣短褐、乘青駒、困於田畝的落魄書生，〈枕中記〉的「核心主題」體現於盧生入夢前說出「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的理想（李昉，2005，卷 82，頁 279），相較於〈楊林〉單純尋求婚配的欲望，擴大為對仕途、門第、家族興盛與歷史功業的追求。

〈楊林〉與〈枕中記〉的「敘事視角」皆以第三人稱順敘的方式陳述內容，不過前者全然以史家筆法紀錄，純粹運用第三人稱全知視角如同記事一般，並無內心獨白與抒

情內容的描寫。後者《枕中記》則在第三人稱敘事中嵌入靈活的對話，也深刻描摹盧生的心理情緒波動。像是當他遭同僚嫉妒，慘遭圍捕而惶恐萬分的神態，甚至向妻子哭訴山東老家本有田產，又何苦追求封官加爵的生活：「吾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李昉，2005，卷 82，頁 280）盧生親身經歷官場萬般險惡，而在窮途之境感慨不已。

從「角色塑造」的層面來看，《枕中記》主角盧生對於生命的追求積極主動，因此在遇見呂翁兩人暢談之時，才會長嘆道：「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因如是乎。」（李昉，2005，卷 82，頁 279）可見他心中所嚮往的人生絕非平凡度日、過著勤耕苦讀的生活，而是希望擁有登科入仕、光耀門楣的機會。反之《楊林》的主角是一位商人，他僅僅只是偶然間步行至寺廟祈求，正逢廟巫訊問是否願意娶妻，促成了這段榮華富貴夢，自己本身對於人生未來發展並無強烈的渴求。

在「情節結構」上康韻梅指出「志怪的事件組合多半側重於推進或概述由若干轉化構成的序列，較少在單一事件上展開多重可能性與細部延展。」（康韻梅，2004，頁 179-222）《楊林》主要以簡單的時間序列推進：祈求、入枕、婚配、生子、夢醒。然而故事事件的展開並沒有文學性的鋪陳，或是細緻的形容與描述，僅以平鋪直敘且簡潔的敘述帶過一個個情節。《枕中記》而是將事件發生做更細緻化的處理，運用盧生和呂翁的對話情節和互動反應層層推進故事，並詳細描述事情經過。盧生入夢後，文本細密描寫其娶清河崔氏女、進士及第、歷任官職、治水立功、出鎮邊地、大破吐蕃、入朝為相、遭人忌害、貶謫流放、復起封公，乃至老病死亡。這些情節形成一套完整的士人生命歷程，並非單純累積富貴細節，且將唐代官僚制度、邊塞戰功、朝廷權力鬥爭與士族婚姻等現實社會因素納入夢境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枕中記》大量補入官場波折與政治危機；《楊林》中的夢境幾乎毫無挫折，沒有高潮迭起的人生波折，只以「歷數十年，並無思歸之志」概括一段平順富貴。反觀盧生的夢中人生卻充滿榮辱轉折，既能因軍功與政績而位極人臣，也會因宰相忌憚、流言中傷而被貶，又因被誣與邊將交結而下獄，甚至一度絕望到引刃自刎。由此可見唐傳奇把追求功名背後的危險、恐懼與不安一併寫入，完整陳述當時士人生命的樣態。這也是兩者在「情節結構」上的明顯差異。

此外從「背景與世界觀」的角度觀看，《枕中記》對子孫繁衍與門第婚姻的描寫，也比《楊林》更具社會現實的影射意涵。《楊林》僅簡單交代楊林生六子，皆為祕書郎，帶有志怪敘事中公式化的富貴想像。然而《枕中記》詳細列出盧生諸子之名與官職，並且強調「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李昉，2005，卷 82，頁 279）。這些描寫使夢中富貴不只是個人功名，而延伸為家族繁盛、門第上升與士族聯姻。由此可

見，唐代文本所增補的故事細節，也包括當時社會對科舉、家族、婚姻與士族聲望的複合想像。

若就〈楊林〉與〈枕中記〉的承繼關係來看，唐代文本保留了藉由枕頭入夢體驗人生的基本故事設定，其餘增補方向不只是文辭繁複或篇幅延長而已，更把六朝志怪中偏重神異物件與異境經驗的故事，改造成一則深具唐代社會色彩的士人敘事。其中有科舉入仕的理想，有邊功與宰輔的榮耀，有朋黨構陷與貶謫流放的危機，也有門第婚姻與家族繁盛的追求，而成為唐代士人現實欲望與社會處境的濃縮投影。

肆、唐代社會與價值

由上述傳奇與歷史之關聯，可知文學確實能映射某些層面的社會價值，也正是因為唐代以詩賦取士，大量青年才子立志於考取功名，這也使得追求富貴功名成為時人強烈的慾望，〈枕中記〉故事之中人生順遂美滿的夢境，即是建立在對於唐代科舉、士人價值的諷刺之上。「進士功名、娶名家之女、官拜宰相等人生藍圖，都在作者筆下通過具體時空形式納入現實。」（廖珮芸，2014，頁 94）因為榮華富貴背後其實是幽暗險惡的官場人生，作者以夢境揭開這層虛幻的面紗，諷刺社會上那些汲汲營營執著於追求功名的士子。

儘管〈枕中記〉是唐人虛構的故事，但從「廟祝/妙巫」或「道士」的角色，以及看破紅塵、不應追求功名利祿的價值想法，不難察覺其中的宗教色彩。梅家玲認為「『枕中記』透過一個繁複多姿的『夢』境，以突顯『人生如夢』的主題。」（梅家玲，1987，頁 123）以故事情節、入夢的關鍵階段反映人生如夢，一切外在的追求皆為虛幻的觀念，卻同時也是對人生現實之反映。

〈枕中記〉故事的收場展現作者沈既濟的人生觀，沈既濟的現實人生經歷窮困潦倒之時，偶逢知己楊炎相助，有幸一步登天，任左拾遺並修撰史書，卻因政治鬥爭被牽連貶往東南（王夢鷗，1972，頁 2）。沈既濟大起大落的人生，正如盧生入夢，登高跌重，從前的富貴榮華如過眼雲煙。盧生亦是如此，「當其親歷宦海浮沉、生死磨難後，對人生更易通達」（林彥杏，2012，頁 74），他從逼真的富貴夢境之中領悟所謂人生之適，夢醒後恍然大悟，了解抑制名利貪欲的方式便是將一切置之度外，拋卻人世間的名利榮辱，而最終導向釋然超脫之結尾：

夢中經歷一生的寵辱、窮達，有功名富貴，也有權力鬥爭，才讓他頓悟：『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知矣！』真正停止對於仕宦的追求。（柯潔茹，2007，頁 69）

〈枕中記〉乍看之下會以為是以道教思想為核心的傳奇創作，其實思想內涵被佛教大力影響，由於佛教思想當中，欲望被視為痛苦之根源，泯滅自身欲望，去除對名利、財富的執著，才可能領悟「人生之適」。因此故事在此出現了兩面的解釋觀點，一是為了諷刺社會風氣，揭穿官場之腐敗而作，二是宣揚佛教之思想，倡導滅除對於現實事物的執著，不被人欲所困，而能超脫於現狀，獲得自在。雖然這兩種論點皆是對唐代社會價值的重現，但也能明確發覺士人避世心態逐漸浮現。

〈枕中記〉之於唐代社會，除了如同一面明鏡反映現實，照盡了士人追求的理想、也道盡眾多讀書人的痛處，以一個故事代表一個時代，以盧生一角代表唐朝士子的人生歷程。然而對於正在經歷失敗的讀書人來說，〈枕中記〉點破他們心中所苦，這何嘗不是一種精神上的慰藉呢！

伍、結語

六朝志怪與唐代傳奇之間，並非截然斷裂的兩種文類關係，亦不是由簡入繁遞進的過程。本文透過《幽明錄·楊林》與沈既濟〈枕中記〉的互文對照，所探討的並非情節源流的考證，而是辨析在跨越時代的改寫進程中，如何因應文學意識與社會結構的變遷，窺見文學作品背後的時代價值。

從《楊林》到〈枕中記〉，故事更易最根本的關鍵在於其中承載的生命關懷。六朝志怪立足於對異境奇聞的記錄，異事本身即為敘事重點；唐傳奇則將夢境轉化為反觀現實人生的明鏡。〈枕中記〉藉由鋪敘士人入夢出將入相之歷程，讓功名欲望在情節中延展，又以夢如人生的真切筆法，描繪現實的殘酷，進而展現當時社會潛在的避世心態，並讓讀者在人物命運的起伏中自行體悟何為人生之適。

文學之證史，重點不在於提供實證史料，而在於補足正史難以載錄的精神經驗與價值感受。六朝志怪為唐人提供了豐厚的夢境與神異敘事資源，而唐人則在承襲之中鑄造時代意識完成創新。透過舊事新寫，古老的神異記錄得以容納中唐以降的科舉制度、門第觀念與士人處境，使小說真正成為映照時代精神與生命姿態之窗口。

參考文獻

- 王國良（1988）。《六朝志怪小說論》。文史哲出版社。
- 王夢鷗（1972）。沈既濟生平及其作品補敘。《政大學報》，26，1-7。
- 李昉（2005）。《太平廣記·巫·楊林》。中國計量出版社。
- 林彥杏（2012）。《唐傳奇所見之門第政治及事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玄奘大學。
- 柯潔茹（2007）。《唐代士人悲觀意識研究——以唐人小說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

胡應麟（1963）。**少室山房筆叢**（二西綴遺中，卷36）。世界書局。

康韻梅（2004）。從「粗陳梗概」到「敘事婉轉」是以兩組文本為例展現志怪與傳奇的敘事性差異。**臺大文史哲學報**，61，179-222。

梅家玲（1987）。論「杜子春」與「枕中記」的人生態度——從「幻設計巧」的運用談起。**中外文學**，15（20），112-132。

陳昶融（2016）。**述異與異述：唐人小說集同題敘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

廖珮芸（2014）。**中晚唐傳奇研究：世變與現實的再現**〔未出版之博士論文〕。東海大學。

魯迅（2011）。**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新潮社。

蕭鳳嫻（2000）。〈枕中記〉所載唐代士人仕宦觀念及其意義探究——以儒家「君子的理想」為核心之考察。**鵝湖月刊**，297，37-45。

龔鵬程（2009）。**中國文學史**。里仁書局。

From *Yang Lin* in *You Ming Lu* to *Zhen Zhong Ji*: The Inheritance of Six Dynasties *Zhigai* and Tang *Chuanqi* and Their Social Implications

Jin Chen *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literary genres is perpetually intertwined with socio-historical contexts, shaped by prevailing social mores, intellectual values, and religious belief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historiography, a clear lineage of transmission and innovation exists between the Six Dynasties' *Zhigai* (records of anomalies) and the Tang dynasty's *Chuanqi* (tales of the marvelous). While Six Dynasties *Zhigai*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factual recording of anomalies aimed at preserving supernatural occurrences, Tang *Chuanqi* marked a transition toward conscious artistic creation, employing fictional plots to convey intellectual insights, mirror social realities, and reflect literati psychology. Prior scholarship has either emphasized the generic conventions of Tang *Chuanqi* or traced the intertextual lineage between *Zhigai* and *Chuanqi*. Building upon these foundations, this study 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broader socio-cultural significance underlying the textual adaptation, examining Shen Jiji's *Zhenzhong ji* (The Story within the Pillow) and its structural prototype, "Yang Lin" in *Youming lu*, to explore their narrative inheritance and the socio-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Tang era reflected therein.

Employing literature analysis, close reading, and comparative methodologies, this study utilizes "narrative elements"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delineate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from *Zhigai* to Tang *Chuanqi*. It investigates the disparities between "Yang Lin" and *Zhenzhong ji* across five narrative elements: theme, plot structure, characterization,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and setting/world-building. Furthermore, by situating the texts with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s of Tang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culture, lineage consciousness, regional military commissioner (*fanzhen*) dynamics, and Buddhist-Daoist thought,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authorial motivations and ideological implications behind the adaptation, adopting the methodological lens of "corroborating history through fiction" to scrutinize the dialect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literary texts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Zhenzhong ji* is far from a mere repetition of the narrative frame of "Yang Lin." Instead, through the expansion of plot, the psychological deepening of characters, and the elevation of narrative techniques, it transforms an account of the supernatural into an allegorical *Chuanqi* that conveys philosophical wisdom and satirizes social realities. This adaptation reflects the spiritual anxieties and existential postures of mid-Tang literati caught amidst intense examination competition, political volatility, and bureaucratic frustration. Ultimately, the textual transformation from "Yang Lin" to *Zhenzhong ji* not only encapsulates the literary transition from Six Dynasties *Zhigai* to Tang *Chuanqi*,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hallmark of Tang literati fiction: the conscious projection of sociopolitical concerns through imaginative storytelling.

Keywords: The Story within the Pillow; Youming Lu; Tang Chuanqi; Zhigai Fiction; Fiction as Historical Evidence

* Department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pankutze@gmail.com

The paper was published under two double-blind reviews. Received: July 1, 2026. Accepted: August 20, 2026.